

疫中生机 跨境电商激发外贸活力

■ 本报记者 张伟伦

最近常有人说,非典时期成就了京东和淘宝,现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电子商务、数字经济又呈现巨大发展潜力,成为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恢复发展的重要引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促进外贸基本稳定,要加快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这是跨境电商连续第6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跨境电商作为外贸新业态,对稳外贸增长有重要意义,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及“跨境电商”有利于行业发展红利的持续释放。

电商业首先与物流业分不开。据英国物流网6月26日的消息,中国电商热潮正在推动一系列新包机业务和货运航线,彰显了疫情下经济复苏的活力。据悉,阿里巴巴旗下的菜鸟物流将未来9个月的出口包机数量增至1260架次。而在刚刚过去的5月至6月,菜鸟国际的包机量已接近300架次。此外,国际第三方物流巨头Seko(新功)公布的数据显示,随着足不出户的顾客不断增加网购订单,2020年中国的

电商交易量已创新高。

财贸智库跨境业务研究员苗柯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跨境电商”连续多年被政府报告提及,对跨境电商的扶持不断从探索设立延伸到扩大跨境电商综试区、完善相关政策扶持,这说明跨境电商正在成为一股新的趋势,对稳外贸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为了更好地推动跨境电商发展,便利跨境支付,应对疫情冲击,国家有关部门也及时出台一系列措施促进并进一步规范贸易新业态跨境收款以及出口报关等方面的管理。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支持贸易新业态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为支持贸易新业态发展,对跨境支付、跨境电商外汇管制做出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包括跨境电商企业可将出口货物在境外发生的仓储、物流、代收等费用与出口货款进行轧差结算。《通知》指出,从事跨境电子商务的境内个人,可通过个人外汇账户办理跨境电子商务外汇结算等。境内个人办理跨境电子商务项下结售汇,提供有交易

额的证明材料或交易电子信息的,不占用个人年度便利化额度。

苗柯认为,这一政策有利于跨境支付的规范化管理,在全球疫情形势下有利于激发国内外外贸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发展活力,便利其跨境结算,也有利于打击非法跨境支付平台。

国家外汇管理局总经济师王春英就发布的《通知》表示,外汇局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并指导银行和支付机构完善内控,强化风险防范。近期国家外汇管理局加大了对违规办理支付业务机构的处罚和公示警示力度。

疫情下最大限度地激发国际贸易的活力也是各国政府部门的初衷。6月初,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部长朱林通过中国电商平台的网络直播,向中国消费者推介泰国水果,当天近5000个榴莲、2万个椰青等被抢光。此外,不少国家的驻华大使、领事和参赞也携各国好物直播带货,搭上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快车”。

跨境电商平台Shopee(虾皮)的跨境业务总经理刘江宏透露,今

年一季度,平台总订单数同比增长111.2%,逆市增长的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企业复工复产时间较早、节奏较快,抢占了先机。

基础设施完善,工业门类齐全,这让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在疫情过后更加凸显。B2C在线电商平台CEO何建表示,疫情发展的三个阶段正好对应应该平台建设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平台主要是努力寻找供应商;第二阶段思考该平台适合该阶段售卖的商品;最后第三阶段随着消费信心复苏,主抓如何更好地把握机会,实现销售增长。

对于未来跨境电商的机遇,何建表示,从全球角度来讲,欧洲是其主要市场,因为疫情大家都无法出门消费,反倒加快了从线下到线上购物行为的迁徙,也就是一步提升了线上购物渗透率,这也为整个在线零售业电商带来了机会。此外是品类类机的增长。因为疫情,不少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他们更多关注运动和健康。同时,家庭成团生活在一起创造了更多的家庭、家居消费场景。

互联网企业出海切忌“套模板”

■ 本报记者 陈璐

“从2018年、2019年数据来看,互联网出海企业高速增长,特别是在游戏与短视频领域。比如,腾讯一季度的财报中游戏业务增长26%,网易增长了13%。而日本、印尼、美国、欧洲等成为热门出海地区。”浙江垦丁律所资本市场负责人朱莎在出海互联网法律实务大会上拿出了扎实的数据,她指出,未来,还需要重视精细化的本地运营。

实际上,很多企业在出海时,“两眼一抹黑”,容易轻信中介所谓的提供一站式的法律服务或者一站式全服务的承诺,而忽视了对当地的监管体系等多方面的了解。

“不少案例表明,中介机构通常仅提供一套关于注册、报税等方面的模板,以互联网企业为例,股权结构复杂,包括外国、全中资、控股、参股等形式,一套不做情况甄别的模板,极有可能带来风险。”朱莎指出,比如,一中企使用中介提供的模板与印方签署协议,约定采用国际常见的银行托收(见款发货)的方式,中方付钱后,印度出口商以各种理由不发货。该中企再去仔细研究模板后,发现案件管辖地约定在印度德里,由于跨海维权困难程度较高等原因,之后只能不了了之。

“此外,大部分国家都有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对于外商持股比例也有相应的要求。”朱莎说,印尼之前对外资管控严格,但在2018年后,基本上放开对电信、互联网接入、数据通讯领域的限制,因而,电商、支付、物流、游戏类领域的企业在印尼的发展势头相对较好,但若涉及托管、外汇期货等互联网金融业务,则面临随时被印尼的监管部门叫停的可能。

各国对互联网创业企业支持政策各不相同。朱莎提到,比如,

日本银行类金融机构不太愿意支持互联网企业,创投基金的态度也比较两极分化,因而,多数中企会选择跟日本当地大型集团企业设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德国很多投资机构比较喜欢投资物流、硬件、通信等传统行业,若互联网企业去日本或德国,投资前,需要对资金进行预先筹划。

税收是出海企业避不开的环,各国情况差异明显。朱莎指出,阿拉伯地区存在“低税率、高税负”的现象,在阿联酋,增值税仅5%,但企业在完成第一笔交易后的20天内必须报税,若延迟,将面临约44万元人民币的罚款。而非居民企业在南非所设分支机构的企业所得税率高达33%,所以企业要对出海产品价格进行规划。此外,有着“避税天堂”之称的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和开曼群岛等相继出台“BVI经济实质法”与“开曼经济实质法”,要求在当地注册成立从事特定活动的公司、合伙企业等实体应具备充足的商业实质,否则将面临被罚款甚至是注销的风险。5月中旬,BVI收到经合组织发布的金融账户尽职调查的通知。这意味着通过空壳公司间接协议控制的避税模式将告一段落,除非在当地有实体经营或者派代表驻地。

朱莎强调,劳动关系是企业的需重点关注部分,需要适应各国政策,比如,印尼限制外籍劳工数量,即使罢工也要付工资;南非要照顾各族群的利益,不同工种最低工资也不同;阿联酋则相对开放,90%的劳工是外籍的,但需要尊重穆斯林的习俗,如周五放假、斋月休息等。

“从东道国的监管政策,了解相应的管理规定,再具体适用到投资过程中,反哺业务线上,可以避免走弯路。”朱莎称。

外汇局:中国外债结构持续优化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3月末,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为20946亿美元,较去年末增长373亿美元,增幅为1.8%。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指出,近年来外债规模平稳增长,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持续扩大开放的进程。随着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不断推进,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认可度进一步提升。

王春英称,预计未来外债仍将保持平稳运行的态势。疫情防控期间,人民银行、外汇局出台多项跨境融资便利化措施,进一步扩大企业借用外债空间,便利企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多渠道筹集资金,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是将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由1上调至1.25,企业借债空间从原来净资产的2倍

提高至2.5倍;二是扩大外债便利化试点,支持试点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在一定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并扩大一次性外债登记试点范围;三是建立外汇政策绿色通道,企业可在线上申请外债登记。数据显示,便利化措施未引发外债规模大幅上升,外债风险总体可控。随着政策效应逐步显现,预计未来外债仍将保持平稳运行的态势。

王春英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改变,国际收支总体平衡的基础依然坚实,有利于外债继续平稳运行。下一步,外汇局将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稳步推动金融市场开放,在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同时有效防范跨境融资风险,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葛孟超)

中小微企业社保减免政策延至12月底

日前,人社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明确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政策实施期限。

《通知》明确,各省份免征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的政策,延长执行到2020年12月底;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

(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的政策,延长执行到2020年6月底。湖北省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的政策,继续执行到2020年6月底。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可继续缓缴社会保险费至2020年12月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李心萍)

以多边主义 应对去全球化的风险

日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凯玛尔·德尔维什发表文章指出,高度一体化和零库存生产的全球化模式意味着全球供应链上任何一环出现问题整个供应链就无法运行,疫情赤裸裸地暴露了这一缺陷。一定程度上的去全球化似乎无可避免而且是合理的,但想要同时保证全球经济发展还要依靠更加深入、包容和高效的多边主义。

文章指出,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中枢,中国万幸控制住了疫情,经济也开始慢慢恢复。但谁也无法保证下次疫情危机或自然灾害或政治决策不会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更严重、更长期的危害。去全球化的过程也伴随着很多风险。各国寻求供应链多元化肯定会造成冗余,增加生产成本,囤积关键物资也会遇到资金困难。大型经济体或许能承受这些损失,但中小经济体则不能。为了环保征收碳关税或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贸易和外国投资都会使问题复杂化,加剧政治紧张局势,引发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增加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以中美为中心划分两大贸易阵营的方式或许会一定程度上减少去全球化的经济损失,但迫使他国选边站队会进一步导致全球经济政治化,破坏国际秩序。双方长期对立还可能危及世界和平。即使欧洲等向往合作的国家形成第三阵营,也很难抵消其消极影响。

文章强调,更好的办法是推动高效的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比如,在公共卫生领域,由世卫组织监管建立庞大的共享预警系统,在各地区中心储备医疗设施,商议疫苗研发生产的融资协议。这样才能提高全球应对大规模疫情的能力而不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国家安全方面,各国在网络空间、数据治理、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领域都需要商议“军控条约”,这样既能鼓励科技创新又能避免让新兴科技武器化。在特朗普排斥国际合作的情况下,想要建立新的多边主义几乎不可能,但美国早晚会上选出一届政府。无论如何,人们都应尝试通过多边主义来尽力减少去全球化带来的损失。(编译:孙巧玲)

世贸组织上调 今年全球贸易前景

据菲律宾通讯社消息,世贸组织(WTO)最近更新了今年的全球贸易前景,预测其“不太可能发展至最坏的情况”。WTO曾在今年4月预测,全球贸易今年将下降13%至32%。

WTO总干事阿泽维多表示,我们目前正朝着更乐观的方向迈进,如果全球贸易量在今年剩余时间每季度反弹2.5%,那么其2020年总体下降幅度将为13%左右。政策制定者将决定经济复苏的步伐,要想在明年实现产出和贸易的强劲反弹,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必须同向而行,而封锁贸易意味着不确定性、供应冲击、生产力下降等。(下一)



顾客在澳大利亚悉尼北部华人区购买粽子。澳大利亚华裔人口众多,中国传统节日深受民众喜爱。一颗饱含家乡味的粽子不可或缺,形状各异,不论甜咸,都是慰藉乡愁的美食。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 摄

走出舒适区 寻找新的发展模式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大多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突然中断。中国抗疫进入常态化后,如何使企业在复工复产中快速磨合达到甚至超过中断之前的运营状态?多位专家日前在安泰视界第三季直播课上,共同探讨如何重塑企业成长之势。

“疫情下,很多企业生产经营出现了问题,到处‘求救’,疫情对企业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总裁谢坚看来,这次疫情损失惨重或者受影响特别大的企业,往往是企业本身的健康度存在问题。一般而言,正常经营的企业要保证六个月的现金流。如果企业在疫情中现金流都不能支撑3个月,就说明企业自身的管理危机。现金流出现问题,想融资也不容易,企业融资能力本身反映了投资者或者是银行机构对企业组织未来的成长度和健康度的一种期许或者判断。

“另外,如果企业内部一直是僵化和固化,技能单一,那么企业在疫情当中肯定会出现问题。”谢坚认为,当企业不了解市场变化,离消费者越来越远时,任何的决策可能都会导致企业市场收缩。

所有的企业都在干管理和经营两件事,管理是在提升内部效率,经营是在创造顾客价值,因顾客需求而随时变化。

“任何企业在面对环境改变时,要维持增长,必须走出舒适区,找到一个新的市场或者模式。”交大安泰经管学院副院长井润田表示,企业可在原有的市场对产品进行升级。比如,英特尔公司开发出新产品,在竞争对手赶上之前设置高价,当竞争对手逐渐适应时,降低售价,通过此种方式获利润再投入产品升级之中,使得每一轮竞争之中都始终处于优势。另外,企业也可停止旧有业务,

开发新产品业务线。

东莞市展贤皮具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曹贤友指出,展贤皮具属箱包类外贸工厂,多年为知名品牌代工,有着很强的箱包设计和研发能力。疫情期间,企业整体外贸订单下滑70%,工厂1/3产能停滞,海外客户直接称半年内订单很难恢复。对此,他们通过阿里巴巴1688平台进行转型内销,3月复工以来,借助阿里巴巴大数据支持,企业针对国内市场开发出新产品,4月销量已有比较明显的增长。

“面对疫情,企业首先自救,若有余力,也可以帮助其他企业。”谢坚介绍,我们对自己的全国经销商,提出“1+1+1”救助方案,比如,直接帮扶经销商,为其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超40亿元金融助力,免费开放旗下3D设计云软件及IMP筋斗云平台、数字营销、设计工具、远程服务赋能经销商等。

地方版新基建行动方案密集出台

今年年初,不少地方出台了今年重大建设项目任务清单,里面已经包含了不少新基建项目;全国两会前后,多地又密集出台行动方案。其中,北京市方案则重点围绕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数据智能基础设施、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科创平台基础设施、智慧应用基础设施和可信安全基础设施六大方向,同时提出了30项重点任务;上海市方案明确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新基建四大重点领域——以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为主的“新网络”建设、以创新基础设施为主的“新设施”建设、以人工智能等一体化融合基础设施为主的“新平台”建设、以智能化终端基础设施为主的“新终端”建设;广州市征求意见稿则提出要重点聚焦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4领域,并明确了38项重点工作。

财政部专家库专家唐川表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增长转

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地方政府以消费和有效投资带动各行业均衡发展,全面升级已成必然选择,产业配套和基础设施都面临向高标准服务转型的整体诉求。“在此过程中,新基建是促成服务转型乃至经济动能转换的关键要素,各地抢先在新基建上发力,有助于形成地方的发展优势。”

比较分析不同地区新基建方案后,中国人民大学高礼研究院助理教授王鹏认为,各地方方案在新基建基本技术、内涵和应用等方面内容基本一致,但具体技术和应用领域有着各自特色,体现了地方政策的灵活性。“北京市方案注重政务服务服务平台建设,重点提到新基建要跟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定位相融合;上海市方案注重与地方特色产业相融合,另外突出‘城市大脑’的建设,助力未来城市精细化管理。此外,很多地方方案都给出了应用场景,比如新基建如何与交通、社

区管理等具体业务相结合。”

对于近段时间多地相继出台新基建三年行动方案,以争夺新基建赛道,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石建勋表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说明地方政府对这个领域相当重视。“但各地发展新基建时也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不能‘一窝蜂’,互相攀比投资规模,盲目上项目,造成一些不必要或不成熟的投资;二是要循序渐进,根据地方政府的财力量力而行;三是要和城市的具体发展情况相结合,每个城市对新基建的需求和应用不尽相同;四是要立足本土,加强科技创新,发展新基建需要一些不被外国‘卡脖子’的核心技术作支撑。”

多地同时发力新基建还可能带来投资、建设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以当前备受关注的数据中心建设为例,中国IDC圈市场顾问邵向飞表示,虽然从未来5至10年来看,随着5G技术大范围应用,

数据中心用户会有很大增长,但短期内其市场规模还是有限。当前不少钢铁、房地产、电力企业将投资数据中心作为一个风口,短期内确实促进了行业的快速发展,但也需要及时关注市场的饱和程度。

新基建不仅市场广阔且投资规模也很大,因此发展新基建不是政府唱“独角戏”,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从地方政策来看,北京提出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原则,发挥社会资本主体作用;上海提出“政企协同”原则,通过贴息等方式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重庆则提出在城市智能中枢、传统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等领域适度放宽市场准入,探索新基建的盈利模式。

不同于传统基建,新基建的软件系统、硬件设备需要更高频次的迭代。唐川认为,出台相应金融扶持措施,解决企业在资金方面的后顾之忧之利于新基建项目的长远、健

康发展。在具体方法上,除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地方产业基金对参与新基建的企业提供更为全面的资金配套外,还可以在专项债、ABS(资产证券化)、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工具的使用中,给予一定政策倾斜。

在王鹏看来,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的形式很多,比如投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特定领域特许经营权,另外运营、运维方面也可让社会资本参与。“要想促进新基建项目持续健康发展,长期来看,可以设立专门针对某一类、某一地区或某一大型项目的产业基金。同时,社会资本的参与也需要注意:一是资质问题,有些新基建项目可能涉及国家安全或公共隐私,这就需要制定完善相关的规则或制度;二是金融风险问题,新基建项目可能存在周期长、投资大等特征,所以需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高洋洋)